

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 庄孔韶, 方静文

[摘 要] 回顾了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从最早的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到在工业社会的霍桑实验和曼彻斯特车间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提出的结构视角一直为人类学所坚持,并成为人类学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以人类学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为起点,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思想加以延伸,就得到“作为文化的社会网络”,可以为时下偏重结构而将文化作为结构的对立面而忽视的社会网络分析增加文化的视角。

[关键词] 社会网络;结构;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2)03-0046-07

A Review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Social Network

ZHUANG Kong-shao, FANG Jing-we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rom the study on kinship at the earliest stage to Hawthorne Studies and Manchester Workshop Studies at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dvocated by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with Alfred Radcliffe Brown as the representative, has long been accepted by anthropologists and thus becom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tarting from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informal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s try to expand the perspective from "studying organizations as cultures" to "studying social networks as cultures", adding an extra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hich has so far been neglected because current studies are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studies of structures and cultures are treated as the opposite of structure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culture

社

会网络分析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它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活跃于人类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流行病学、组织研究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并被广泛地应用于求职和职业流动、城市化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社会认知、传播、交换、疾病与健康尤其是艾滋病等问题的研究中,^[1](P350~351)]而且其应用领域仍在快速地几乎是呈直线式地增长。^[2]以社会学为例,对美国两大顶尖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期刊》(AJS)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的统计显示,以“网络”为关键词的论文在过去 20 年呈上升趋势,比重越来越大。从 1980 年的 1.2% 到 1990 年的 2.2%,再到 2000 年的 7.8%,至 2005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 11.6%。^[3]

首先,何为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社会网络’概念最初是由巴恩斯(John Barnes)于 1954 年提出的。”^[4]但网络研究者一般认为,社会网络分析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计量学中就已发端,甚至能够追溯至更早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甚至更早的孔德的思想。^[5](P14)]

目前,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争论不仅在于重要概念的界定、测量和资料收集方法,还在于对社会网络分析本身的定位上,即社会网络分析是否只是各种具体分析方法的结合,抑或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

学者如巴恩斯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社会网络理论”;^[4]斯科特^{[6](P57)}也指出,社会网络分析只是“朝向认识社会现实的一种研究倾向,尽管它有自己的的一套独特的方法。但是,它却不是一个由特定体系的正规的或有实质性内容的社会理论”。另外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能够在社会网络方法中找到“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7](P12)}哈蒙和卡利(Hummon, Carley)^[8]甚至宣称,网络分析已接近库恩主义者所提倡的“成熟范式”。

由于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定位存在争议,对“社会网络分析”这一概念也缺乏一致的、明确的界定。如韦尔曼(Barry Wellman)^[9]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认为:“网络分析者……试图描述[一般的网络模式]并利用其描述了解网络结构是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较为普遍的对于社会网络的界定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角度入手,“社会网络存在于任何社会行动者由或多或少的持续关联(或关系)相联结的地方”。^[3]弗里曼(Linton C. Freeman)也指出:“在社会科学中,以对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研究为基础的结构方法被称做社会网络分析。”^{[5](P2)}

对既往研究的回顾表明:尽管对社会网络分析的界定各有侧重,但是社会行动者、关系和结构视角这三个要素是社会网络分析不可或缺的。这里的社会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非个体的群体、企业甚至国家,这里的关系既可以是个体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正如弗里曼所说,“社会网络分析所研究的关系通常是那些将个人联系起来的关系。但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可能把诸如密封、鹿、猩猩、猿猴等一些并非人类的个体联系起来。或者它们也可能是一些并非个体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网络分析研究者经常会探讨群体或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时候甚至会是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联系”。^{[5](P2)}而这里所谓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关系模式的表达,而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结构研究的基本进路”。^[9]

一般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社会计量学。德国的雅各布·莫雷洛(Jacob Moreno)是社会计量学的主要推动者,他将网络概念应用于对社会互动的研究,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网络方法带到了美国,推动了认知和人际关系的网络研究。第二,数学。包括抽象的数学模型和理论如偏向理论和图论。第三,社会人类学的经验研究,^[10]尤其是“倾向于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组织问题的实际研究人员”。^{[11](P16)}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的介绍和总结性专著。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社

会人类学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加以回顾。

一、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早期研究

(一)非工业社会的社会网络研究——亲属关系

人类学的社会网络研究肇始于对亲属关系的研究。自产生之日起,人类学就以对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文化上都离自己很遥远的“他者”及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类社会往往是前现代的前工业化社会,缺少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亲属关系是成员间最主要的社会联系,而且,人类学家相信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用于描述亲属关系的术语即亲属称谓体系,是非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等社会关系的体现,所以,亲属关系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代国际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社会学教授弗里曼(Linton C. Freeman)评论说:“我对亲属关系研究在社会网络分析历史中的重要性感到震惊。”“最早的系统性的网络分析是集中在对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的。”^{[5](P149)}

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早在研究易洛魁部落的过程中,摩尔根就曾发现易洛魁人(Iroquois)亲属称谓与现代美国社会的亲属称谓截然不同,而之后在对其他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与易洛魁人的亲属称谓制度却是大体相同的。此后,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以及通过信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投递和回收问卷,摩尔根收集了大量民族志资料,集中收录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一书中。该书描述了世界上多个民族的独特的亲属关系和亲属称谓,说明亲属称谓并不是普遍的,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亲属称谓体系。除了亲属关系资料的收集之外,摩尔根还开始尝试用图形来说明等同亲属的位置关系。^{[5](P20)}

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认为对于亲属关系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推测的方法,另一种是结构分析或社会学分析的方法,^{[12](P51)}受杜尔干影响的他主张后一种方法,认为“所谓的亲属制度就是……社会关系的网络,它是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总的社会关系网络被称为社会结构”。^{[12](P56)}

布朗把社会人类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试图建立一门基于人们之间关系的科学,为此提出:

首先,只要可以对现象进行测量;其次,只要关系分析是可能的,或者说可以区分并刻画出系统,那

么一种自然科学就是可能的。在关系分析中可应用非量化的、关系数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系分析即使不是量纲式的,对于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来说,它的充分发展最终所需要的数学将不是量纲式的,而是到目前为止被忽视的数学分支,即关系计算,我认为总的来说他要比量化的数学居于更基础的地位。^{[13](P69)}

弗里曼认为,布朗完全预见到了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发展,提出了对该领域各类模型的完备描述。^{[5](P93)}

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社会结构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社会结构的概念成为英国人类学界的一个主导性概念。与此同时,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也波及了法国和中国的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

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坚持从结构性的视角研究亲属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传统的亲属关系研究存在两大缺陷,即一是只看到亲属关系中单个的成分,而忽略了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关注亲属关系的起源和历史演进,而忽略了横向的结构研究。^{[14](P266)}他吸收了布朗的“结构”思想以及雅各布森和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试图勾勒出多样的亲属关系背后的深层的、普遍的结构。他将庞杂的亲属关系归结为八元四组关键亲属——夫妻、兄妹;父子、甥舅——的二元对立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还提出了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所持的“世系群”理论针锋相对的“联姻理论”,将婚姻关系视为男人为了男人间的关系而交换女人,而正是这种交换,促成了人连结成整体。^{[14](P270)}

列维—斯特劳斯还使用一些谱系图和有向图来呈现亲属关系,并说服数学家安德烈·维尔为亲属制度建立代数模型。^{[5](P72~73)}

但是在1949年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逐渐从亲属关系转移至神话,其“结构”也开始成为区别于布朗的经验的“社会结构”的“思维结构”。

在中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随着与英美人类学接触的增多以及拉德克利夫—布朗1935年的访问进入中国。布朗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林耀华作为研究生参加了布朗主持的课程,并且担任其助教。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林耀华同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15](写于1935年)中已有所体现。但是,集中体现的还是其成名作《金翼》。《金翼》以英文写就,初版于1944年。其时,他已经取得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因此,书中还反映了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一些最新进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费孝通先生从国外回来,进一

步传播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的结构—功能主义。我晚些回来,又带来这个学派较新发展出的均衡或平衡论。”^[16]

“平衡论”(equilibrium theory)是后继者面对当时学界对结构—功能论局限于对小群体的研究,忽视内部差异和外部世界的影响;而且强调社会系统是由一群处于平衡状态又互相支持的要素所组成,因而无法为社会文化的变迁提出有力的解释等批判做出的回应和改良。用平衡论来解释社会,是林耀华和同样参加哈佛研究生班的查普尔(Eliot Chapple)、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共同的学术取向。^{[17](P60)}

在《金翼》中,林耀华先生写道:“从东林和他的家庭关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着一种关系体系。”“在对东林早期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提出了这种体系的概念。我们勾画了由竹竿和橡皮所组成的框架结构,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一个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到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18]

(二)工业社会的社会网络研究——非正式组织研究

在亲属关系研究之外,随着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初民社会的渐行渐远,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广大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从亲属关系延伸至乡村、城市、企业、组织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结构视角得到了延续,网络分析得到了发展。

1929年,美国人类学家沃纳结束了对澳大利亚摩根人(Murgin)的亲属关系模式和血统规则的研究返回哈佛大学。抱着在现代工业社会实践人类学的热忱,沃纳组织了著名的“扬基城”研究,尝试将研究澳大利亚土著的方法运用于美国城镇的研究。扬基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同时也集中研究了个体间的互动和人际网络。^{[5](P41)}扬基城研究影响巨大,如后来怀特(W. F. Whyte)^[19]对波士顿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研究事实上即受到沃纳思想和方法的影响。通过参与式的田野工作,怀特不仅描绘出游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们的生活状况,也得以厘清“街角帮”等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

1930年,沃纳受梅约之邀加入了著名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Studies),也将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带入其中。在给梅约的一份备忘录中,沃纳指出:

目前在西方电气公司研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要研究和理解每一实验车间的全部社会

组织。这不仅包括公司已经创建的正式的工业结构,而且包括那些由工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结成的群体类组织……^{[20](P45)}

沃纳的加入使得霍桑实验从对个体心理的关注转向了对于工人间的关系和互动和社会结构的关注,对由工人间的非正式联系构成的非正式组织的关注和重视“在当代社会网络分析中依然可见”。而且,在霍桑实验中,人们还发现,文化存在于非正式体系中。^{[21](P7)}所以,相应地,文化也得到了关注。此外,沃纳还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引入了工厂和车间,^{[21](P10)}这种通过田野工作,建立工厂民族志的方法得到了实践并在此后的研究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沃纳的学生查普尔、阿伦斯伯格曾参加过“扬基城”研究和霍桑实验,他们致力于开发一套收集资料的严格程序和描述、分析关系系统的量化工具,并最终在哈佛数学家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的协助下发展出一种“从亲属关系中归纳出来的代数模型”。但是,随着沃纳等人相继离开哈佛,这种模型并未真正得到推广。整个团队在社会网络分析方面的努力也渐渐沉寂。^{[5](P33)}

根据弗里曼的说法,现代网络分析具有四个特征,分别是:

社会网络分析源自联系社会行动者的关系基础之上的结构性思想;

它以系统的经验数据为基础;

它非常重视关系图形的绘制;

它依赖于数学或计算机模型的使用。^{[5](P3)}

以此观之,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网络分析”这一概念,但是其对于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的研究以及结构性视角已经得到了发展,已经或多或少具备了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甚至多个要素,无疑应该归入社会网络分析的早期实践之中。

二、社会网络概念的提出及实践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人类学家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无论是认为各民族的人们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拥有不同的文化——进化论;各民族因特殊的历史和环境而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特殊论;还是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满足人的需求和在社会结构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功能论,各流派共识在于:世界由“民族”(peoples)组成,每个民族都有其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系统。

随着各群体间交流的增多、群体内部异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群体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人类学以往针对于小规模社会的研究范式在研究超越“有边界的制度化群体或范畴”时遇到了困难。于是,有的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具体的关系体系。^[9]

虽然人类学家如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很久以前就在使用网络概念,将之作为社会结构描述的一部分,但社会网络概念的系统形成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明确的“社会网络”概念最初是由巴恩斯(Barnes)于 1954 年提出的。^[4]在人类学家看来,网络是“跨越社会范畴和有边界的群体而联结社会系统成员的一套关系”。^[9]

(一)曼彻斯特车间研究

社会网络概念提出之后,被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而英国人类学是此一时期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

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人类学历史上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该学派秉承拉德克利夫—布朗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开展了许多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

格拉克曼本人非常希望能够将自己在非洲田野中形成的关于冲突等方面的理论应用于其他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包括英国的工业社会。他还在曼彻斯特大学定期举办集中关注结构问题的研讨班。1953 年至 1954 年间,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互动论的代表人物霍曼斯(George Homans)受邀成为该校的访问教授。霍曼斯建议继续霍桑实验的研究主题。但是梅约的“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以及心理学上的个体主义的思想均被留在了大西洋的对岸,取而代之的是对“冲突和分析情境问题”的关注。^{[21](P10)}

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人类学家对曼彻斯特的 5 个工厂进行了考察,旨在探讨“产量法则”与非正式群体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运用细致的民族志方法,从阶级、性别等不同角度考察了车间的生活状况和人际关系,发现:5 个工厂均存在非正式组织,而且,虽然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但不是像之前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发合作的关系”,而是存在着诸多冲突。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得出的冲突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工厂车间内得到了验证和诠释。

而且,与霍桑实验时期相比,曼彻斯特工厂研究从将工厂视为封闭系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车间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以什么作为分析的社会情境成为新的问题。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也在曼彻斯特学派学者的努力

下发展为完全的参与观察。在这一时期,“参与”开始意味着研究者对车间生活的完全参与,并要求研究者学会如何工作,学会工人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并理解他们的观点。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要担当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既要尽力成为局内人,也应当是掌握了可以理解社会的理论的局外人,而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也被意识到了。^{[21](P10~11)}

(二)非工业化社会的都市化研究

除了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网络分析也被用于对第三世界国家都市化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米切尔(Mitchell)在津巴布韦组织了几位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其中,戴维·波斯维尔(David Boswell)关注个人危机和社会支持;彼得·哈瑞斯-琼斯(Peter Harries-Jones)研究政治组织中的部落制;布鲁斯·卡帕菲尔(Bruce Kapferer)研究一家采矿企业里的劳工冲突;佩鲁·威尔顿(Pru Wheeldon)则研究一个多种族社会中政治运动的出现过程等。这些研究的共性均包含有结构性视角,表达了对社会网络的关注。^{[5](P3~4)}

基于欧美国家城市化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农民进城后将不再属于乡村社区的成员,而将成为无根的城市社会的成员。但人类学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路径发现第三世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地理上的迁移并未就此割裂农民与乡村农业社会的关系,相反,大部分移民依然维持着以血缘、地缘和姻缘为基础的关系,就好像从乡村拖入城市的“尾巴”。^{[17](P246)}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在城市建立起各种基于业缘等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乡村进城者所处的是一个同时包含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复杂社会网络,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帮助他们同时从乡村和城市获得资源用以应对城市生活的需要。^[9]这种城乡间的关联和互动使得人类学家可以解释空间和社会流动性背景之下,移民的整合依然存在的原因。以中国为例,“地缘、亲属所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的拉力作用远大于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此种拉力,在城农民会自然形成一个类村落共同体,以某种方式延续着村落传统”。^{[17](P248)}

现在,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区域多样化。有的有些人类学家采用数学工具进行网络分析,如卡帕菲尔^[22]描述了赞比亚一家服装厂的员工之间在特定的背景中结成的互动关系,考察了这些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本身的变迁及其与工厂重大事件如罢工之间的联系;有些则用人际网络来分析权力和依存的政治经济结构。^[9]巴恩斯收集了朋友和亲属关系网络的系统资料,米切尔除了收集了结构资料,还吸收了社会计量学尝试使用图形;博特(Elizabeth Bott)集中关注社会支持和社会控制,并通过测量网

络密度来研究小规模社会的整合。^{[5](P96)}

三、文化、组织与社会网络

受格尔兹观点的影响,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文化不是有边界的实体,而是持续不断地被修正的,模糊性在其中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修正的空间。而且文化研究的学者还为这一过程加入了政治视角,认为:概念和象征的意义不仅不是固定的,还是被积极争论的。^{[21](P4)}以将这种文化观引入组织研究,文化被视为“组织所是”(what an organization is),而非“组织所有”(culture is what an organization has),它不再是解释组织表现的一个属性,而是用来描述组织的根隐喻。^[23]由此得到了一种看待组织的独特视角——“作为文化的组织”,即通过将文化作为根隐喻来看待组织。“当我们将组织视为文化时,我们将它们看作是自身独特价值、礼节、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微型社会。”^{[24](P105)}“当文化作为根隐喻时,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组织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转向组织如何实现以及被组织意味着什么。”^[25]

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视角用于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中,已经在相关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彝族地区利用其家支组织,借助其宗教仪式等族群文化的力量帮助家支成员戒毒,取得了高成功率;对于不同族群女性性工作者组织的考察和比照凸显了族群文化对组织成员入行、串联、流动和交往互动模式的影响,对其组织特征的把握也因而使得更具文化敏感性的流行病干预实践成为可能;而忽略不断变迁的文化则可能给组织造成不利的影响。^[26]

然而,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群体、组织的边界日趋模糊和变动不居,异质性也大大增强,而强调多样性和相对性的文化概念却在其中得到凸显。原来主要针对小规模群体的研究范式必然会出现一些不适,此时,引入社会网络的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进路,旨在揭示人际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个人生活的重要特性。但与以往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如阶层研究相比,社会网络分析者将社会结构视为一个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而非有边界的群体,关注的不是人的社会属性而是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源通过社会网络交换和传递,社会网络因此为个体提供限制、机会和社会支持。因此,对人际互动的网络分析被认为是连接宏观层面的模式和微观层面的互动的“桥

梁”。^[27]

现有的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两个方向。^[28]前者将社会网络视为信息^[27]传递或影响力^[29]传递的途径,展示从社会网络中抽离出来的关系对个体求职过程和职业流动等的影响。后者则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支持的来源,而这种社会支持网络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工具性支持网、情感性支持网和社会交往网络。^[30]不过,无论是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源或资本还是将社会网络作为支持的来源,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个体中心的网络,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关系数据的分析依然主要集中于“个体网络”意义上的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分析,在整体网络研究方面是比较薄弱的。^[31]再者,现有的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与其说是网络不如说是网络所带来的影响,具有功能性和工具性的色彩,对于社会网络本身的如文化等特征关注较少,这与社会网络分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相关。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结构进路被提出和强调,曾长期被与文化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6](P33~37)}布劳(Peter Blau)(1977)^{[32](P245)}说“社会结构不是文化”。怀特(White)^[33]等人宣称“实际关系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相反,我们关注对各种关系类型进行阐释。”而就文化而言,虽然边燕杰等人已经开始关注到“关系”等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核心概念的中国本土性比如指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熟”、“亲”、“信”是中国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并试图用“拜年网”、“餐饮网”、“企业脱生网”等手段对中国的社会网络进行测量。但是,边燕杰本人也承认:“现成的分析工具偏重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而没有充分反映或者完全没有反映中国文化的深层涵义。”^[34]

四、结语

面对社会网络分析中文化视角的缺失,人类学作为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科,应该有所创建。

事实上,人类学对于文化与社会网络的相互影响在早期研究中已经初现端倪。比如前文提及的林耀华先生及其哈佛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们所持的平衡论虽然仍然关注社会结构的平衡,但同时也开始关注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文化环境。

在《金翼》中,林先生强调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和互动的影响,指出:“我们除了解人们为了保持均衡,通过不断调整内部关系以便彼此联系之外,还应看到这种调整适应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技术、

行为、符号及习惯的影响,这些总合称为‘文化’。这些技术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及环境不同而异,他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因此,在我们研究人际关系时,自然不能只看到那些处于均衡状态的人们及其相互关系,还应注意到影响和干预了人们交往联系的文化环境。”^{[18](P223)}而20世纪60年代的曼彻斯特工厂研究中,工人们之间以及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也不再被视为封闭的系统,而是被纳入更大的文化场景中,虽然对这种场景的界定依然存在争议。对于第三世界国家都市化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社会农民进城的方式也具有文化多样性。

如果将上述“作为文化的组织”的思想推及社会网络,就得到“作为文化的社会网络”,我们的关注就不再是社会网络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而是社会网络本身实现了什么以及被社会网络连结意味着什么。从而在社会网络的影响之外增加对社会网络本身及其形成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Freeman, Linton 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efinition and History[A]. A. E. Kazden.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0.
- [2]Otte, Evelien, and Ronald Rousseau.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powerful strategy, also for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2,(28).
- [3]Mark T. Rivera, Sara B. Soderstrom, and Brian Uzzi. Dynamics of Dyads in Social Networks: Assortative, Relational, and Proximity Mechanism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 36, 2010.
- [4]J. Clyde Mitchell. Social Networks[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 1974.
- [5]林顿·C. 弗里曼,著,张文宏,等,译. 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2ed edition)[M]. Newbury Park, CA: Sage,2000.
- [7]Degenne, A., and Froese, M. Introducing Social Networks[M]. London: Sage,1999.
- [8]Hummon, N. P. and Carley, K. Social Networks as Normal Science[J]. Social Networks, 1993,(15).
- [9]Barry Wellman. Network Analysis: Some Basic Principles[J].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1983.
- [10]K. S. Cook, J. M. Whitmeyer. Two Approaches to Social Structure: Exchange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i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8,1992.
- [11]马汀·奇达夫,蔡文彬,著,王凤彬,等,译. 社会网络与组织[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2]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13]Radcliffe—Brown, Alfred Bernald. A Natural Science of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7.
- [14]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15]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16]林耀华.林耀华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17]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8]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9]威廉·富特·怀特,著,黄育馥,译.街角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0]Warner, Mildred Hall. W. Lloyd Warner. Social Anthropologist [M]. New York: Publishing Center for Cultural Resources, 1988.
- [21]Susan Wright, ed.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 [22]Kapferer, B. Strategy and Transaction in an African Factory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1972.
- [23]Cameron, Kim S. and Ettington, Deborah R.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 Agathon,1988.
- [24]摩尔根(Morgan, G.),著,金马,译.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25]L. Smircich. Concepts of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8(3), 1983.
- [26]章文.微观渐进式改革——对武汉某安装公司的人类学与管理学调查报告[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7.
- [27]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1973.
- [28]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3,(03).
- [29]Yanjie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3,1997.
- [30]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上)[J].江海学刊 2011,(02).
- [31]刘军.关系:一种新的分析单位[J].社会,2005,(05).
- [32]Blau, P. M.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 [33]White, H. C., Boorman S. A., Breiger R. L.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 J. Sociol., 81(4), 1976.
- [34]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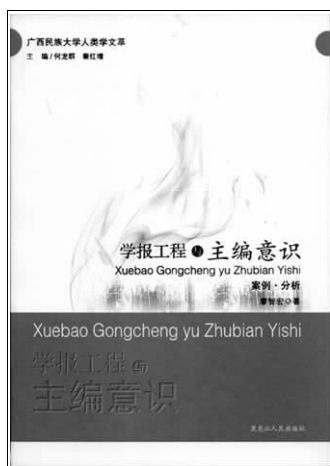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12—02—16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韦琮瑜]

[作者简介] 庄孔韶(1946~),北京人,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汉人社会、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 and 文化遗产保护等。浙江杭州,邮编:310028。方静文(1985~),女,浙江淳安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2。

廖智宏的《学报工程与主编意识》出版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廖智宏从事学报编辑工作 25 载,见证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一家低档次、默默无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相关学科享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著名学术期刊,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名栏、名刊。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着历任主编的办刊意识和办刊理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主编意识到主编理论,系统地总结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基本经验。全书分为主编公关意识论、主编策划意识论、主编前沿意识论、主编开放意识论、主编装帧意识论、主编通联意识论、主编信息意识论、主编学报形象意识论等十个章节,共计 24 万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 20 元。

(郭 岚)